

55
18

目 录

- (序言) 历史不会忘记 王金红 (1)
- 波士顿畅想曲 (1)
- 重庆岁月 (10)
- 拓荒者 (25)
- 难眠之夜 (38)
- 伟大的实践 (46)
- 革命的洗礼 (70)
- 为新中国奠基 (86)
- 十年磨一书 (95)
- 圆梦 (104)
- 张庄——第二故乡 (115)
- 风雨情真 (123)
- 耕云播雨 (141)
-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154)
- 魂系彩虹 (178)
-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 (196)
- 踏着韩丁的路 (231)
- (后记) 人生的支点 (249)

波士顿畅想曲

少年负壮气，奋烈会有时。
唐《李白集·少年行二首》

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一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波士顿。

波士顿的现代文明始于 1845 年的爱尔兰土豆大歉收，五年内，估计有一百万爱尔兰人活活饿死，另外一百六十万背井离乡，许多人来到新英格兰，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安家落户。到 1860 年，波士顿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外国移民，从 19 世纪起，大量的意大利人、波兰人、葡萄牙人也开始追随爱尔兰人而来。

18 世纪末，海上航行实行风险联合承担，促使波士顿大规模保险业兴起，其纺织工业也由于取得了英国纺织技术而迅速发展，美国第一个重要的思想运动——先验论在这里兴起，这里也是在美国国旗下首先废除奴隶制的地方。

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世人的心目中，波士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种是作为历史古迹，一座几乎是欧洲式的招人喜爱的城市，经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新而成为美国最适宜居住的令人兴奋的地方，它是许多年轻专业人员的圣地，他们在这里寻找激动人心的事业和讲究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形象也是真实的，那就是始终存在着族裔和种族之间的分歧，濒临破产的财权问题，公立学校和服务工作衰败以及政治上的僵局。

韩丁的人生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据说，他的祖上是乘“五月花号”到达这里的。他刚满四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 (Miscarmelifa Hinton) 带领他

和妹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镇来到波士顿。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大恐慌，像大多数美国家庭一样，韩丁一家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跋涉，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罩上了一层阴影。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我对未来的忧虑，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艰难的日子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阴影紧紧地跟随着我，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

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母亲表现出她无畏的奋斗精神和乐观主义情怀，她无愧为移民之母——移民家庭的支柱。

起初，母亲在一家小学任教，收入十分低微，以至于为填饱她的几个子女的肚子，她不得不跑遍集市去寻找价格最低的排骨，购买回来精心煮汤。

韩丁回忆起母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和怀念，目光里闪动着一束深切的光。他说：“母亲是个永远不会为困难所征服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每当假日，我和妹妹还在梦中，就听到了母亲的喊声：快起，快起，我们今天去纽约旅行。于是，我们一个个高兴地跳起来，帮助母亲做准备工作，给马备鞍，装好帐篷，灶具，带上现有的食品和水。随后，一家四口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了。

“从波士顿到纽约要走一个多星期，一路上，母亲有讲不完的故事，每到傍晚，我们寻到一处人家，向主人问候之后，在主人的房屋附近支起帐篷，支起随身携带的灶具，大家一起动手做饭，然后是围着篝火进餐，在月光下

游戏，每到这时，母亲会快活地像我们一样，跟我们追逐、跳跃、欢笑，一直到深夜。”

1936年，母亲决定要自己办一所中学，一所男女学生同读的寄宿中学。在当时，这样的学校在美国还很少。母亲的设想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一个学校的主人以极低的租金把校舍交给母亲使用，政府方面表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免税。

母亲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她说：“要办就办成一流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经济萧条带来的艰难岁月使大批知识分子无所事事，母亲很容易地从他们中间聘请了一批优秀人才，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然而，经济萧条也使人们对教育冷漠，孩子们的读书热情不高，生源不足，为了招收良好的学生，母亲四处奔波，在几个州的范围内选择学生。

中学(Pufney School)终于开课了。

母亲是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追随者，崇尚他的理论“Learn by doing”即注重实践在教育中的地位。

她说：“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让他们具有生存能力，不单是传授知识。”她在教学日程中安排有一定的劳动课程，学校的菜地、果园等劳动都由学生参加，教室里的桌椅修理，门窗油漆等均由学生完成。

母亲的这一教学思想在美国引起反响，报名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母亲分外喜欢大自然，每当早晨，她拉开窗帘，发现

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会突然走进学生宿舍，伸开双臂高声说：“孩子们，今天不上课，我们去领略大自然！”

于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田野，爬上山坡，穿越森林，跨过河流，度过一个愉快的日子。

艰难的岁月使年幼的韩丁感悟到生活的严峻，同时也从母亲身上接受了爱好幻想，勤于思考的品德。

也许是先辈们那种探险拓荒精神的遗传，韩丁自幼神往外面的世界，他常常坐在海滩上遥望远方，落日的余辉洒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金波碧澜瑰丽多姿，一艘艘从远方而来的船只给宁静的港湾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喧嚣，也带来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

他从水手那里知道了中国，遥远的东方，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关于龙的传说，关于“羿射九日”，关于“女娲补天”，一个个奇妙的故事使他入迷。水手们从中国带来的一件件工艺品让他眼花缭乱，而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里那些关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发明史的介绍，越发激起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憧憬。

韩丁说：“中国仿佛是一束光环潜入了我童年的梦幻。”

1937年，18岁的韩丁读完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系，在一种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理的驱使下，他决定奔赴远东考察。

远洋客轮在大西洋海面漂荡。晨曦里，韩丁伫立船头眺望远方，海天茫茫，波涛滚滚，在天与海的相连处一束玫瑰色的朝霞把整个天际映得色彩艳丽，鲜美多姿，给人

以无限的遐思。

对于韩丁来说，未来就像一部尚未掀开的长卷，神奇而茫然，但是他始终那样昂扬，因为他深信只有在搏风击浪中才有欢乐的人生。

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客轮停靠日本港口，韩丁踏上了日本国土。

日本正处在军国主义的狂噪中。韩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广泛的接触中深深感到日本已完全被一种野心扭曲了，真理和正义无法报道，他不得不放弃在日本求职的计划，决定取道中国东北回国。

当时，韩丁仅有 10 美元，那是一家报馆付给他的稿酬。购买了一张从日本到中国大连的船票，已所剩无几了。

船靠大连港，这是韩丁第一次走上中国的土地。

蒸汽机车在东北平原上吃力地爬行。透过车窗见一望无际的荒野，枯树干枝在呼啸的寒风中摇晃，偶而有一群群寒鸦在树梢上盘旋，扇动黑色的翅膀，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制造出一片嘈杂。

战壕、弹坑把荒野勾画得支离破碎；时而有战车列成长队疾驰而来，滚过大地，卷起浓烈的烟尘；不时见成群结队的饥民扶老携幼像潮水般涌动。

列车一进沈阳站，还没站稳，两旁就涌上来成群的饥民，一双双污垢干瘦的手向车窗伸来，一双双渴求、绝望的目光深深印入韩丁的记忆中。

年轻的韩丁心里难以平静；在日本几个月的感受和

眼下这令人悲怜的情景使他清楚地预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场劫难，而中国对这即将降临的不幸将持何态度呢？一种疑虑涌上心头。

这就是中国，是他所憧憬的地方吗？

韩丁要经欧洲回美国，身上的钱已不够购买到莫斯科的车票了。他无奈地在车站徘徊，就在这时，一位美国老太太走了过来，亲切地问：“小伙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

“买车票的钱不够了。”韩丁如实地向老人家讲述了自己的来历。

“我帮你—下。”老人取出 5 美元交给韩丁。

韩丁感激地拉住老人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随后买了一张赴莫斯科的车票。

列车经西伯利亚向北飞驰。韩丁为了节省仅有的几元钱，在四天五夜的旅行中只吃了一顿饭。

莫斯科车站，韩丁饥肠辘辘下车，急匆匆闯进—家小餐馆，狠狠心买了一个盒饭，只几分钟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这个情景引起坐在餐桌对面—位老人的注意：“这点饭—定不够吃，我这里有篮子水果，拿去吧。”

也许是饥饿的原因，韩丁没有推辞，说了声谢谢，接过了水果。

韩丁在身上仅有一美元的情况下，从莫斯科经波兰到达德国。那里经常有开往美国的轮船。来到码头，他举目四望，终于寻觅到—面美国国旗。他飞跑着来到这艘船上，向船长说：“我是美国人，要回家乡，钱不够，我可以做

水手。”

说来也巧，船上正缺人手，韩丁被允许上船做工。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轮船到达美国，停靠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波士顿港。

韩丁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远行，也就是这样第一次结识了中国。

又一次点燃他的中国梦是1942年。那个冬天仿佛格外漫长。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整个美国人民在同仇敌忾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那是个飘雪的傍晚，凛冽的寒风掠过灰色的波士顿上空，掠过窄长的大街，发出阵阵呼啸，电线上的麻雀，门口的猫，负重的汽车仿佛都在叹息严冬的凄凉。

韩丁顶着一头雪花，踏着夜色赶回家，饭也没吃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近期以来在全美甚为流行，几乎所有的书店都销售一空。

韩丁一下子被书中的报告吸引了。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

对于韩丁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自从第一次远行归来，“中国”时常在他的脑际闪现，关于中国的传闻也越来越多，但是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号越来越大。

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韩丁从这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那些由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饥饿、疾病、严寒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以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迈开两条腿，横跨大半个中国，把红军那闪亮的五星带进了中国的西北角。

从斯诺的报告里，韩丁了解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人。

从这里，韩丁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

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报告从头到尾洋溢着勃勃生机。

韩丁的心被震颤了。这是何等非凡的壮举啊！是何等宏伟的业绩！又是何等杰出的人才！与此同时，许多新的疑云又在他的心中涌起：进行着这项伟业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奋斗、牺牲、创造奇迹……

当韩丁读完最后一页时，晨曦已经映红了窗口，他依然没有一丝倦意，他轻轻合上书，伫立在窗前，一个强烈的意念撞击着他的心头：到中国去！

重庆岁月

……黑暗中带着巨痛的
人民在前进。
在夜色里，头顶着满天星斗
的
人民在行进：
“上哪去？下一个是什么？”
——卡尔·桑德堡
《人民·是的》

1945年初春，韩丁第二次来到中国。

这是中国抗战和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9月9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

韩丁这次是作为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一员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新的宣传动向，向美国政府提供宣传分析资料。起初的几个月，韩丁和一名英国人，一名中国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时政宣传，先是在昆明，后到武汉，给中国军民放电影，还自己动手做幻灯片。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身背放映机，爬山涉水，顶风冒雪奔波在长江南北的广大城乡。

韩丁回忆起这段生活说：“我实际上加入了迎接反法西斯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行列，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众那种以民族重大牺牲取得胜利后的欢欣鼓舞，对新生活的向往，中国正处在新世纪的前沿……”

不久，韩丁接到命令来到重庆。

云遮雾罩的山城，曾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反动统治。

韩丁每天上班都要从一些因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的尸

体旁走过，目不忍睹，沿街乞讨的老人、儿童成群结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垃圾桶旁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觅食者。而那些老式小轿车，美式吉普车满载着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烂醉如泥的美国兵，不时地风驰电掣般穿过人群。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威胁着贫苦百姓的生计，米店前排成长龙似的求购者闪烁着一双双凄楚的目光……

韩丁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抗战胜利为什么对中国百姓的命运没有改变？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清楚了，造成这种通货膨胀和灾难的祸首是那些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家和美国官员。

初春的一天，我从重庆往武汉，搭乘一架由昆明经重庆、汉口，飞往上海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登机以后，我看到飞机上只有三名军官，空无一物。一打听，原来这架飞机是一名驻上海的空军上校准备飞往昆明购买鸡蛋的，结果到昆明发现鸡蛋的价格比上海还高，只好空机飞返上海。”

4月的一天，韩丁采访到东北沈阳，住在一家酒店里，他发现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上海来的投机商人，多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买手，他们专做黄豆生意，这里是黄豆产区，他们以二角或三角一磅的价格把市场上的黄豆抢购一空，用军车或轮船运往港口，以七角或八角一磅的价格售往欧洲。由于运力不足，大批黄豆积压在货场上，韩丁所到的车站，铁路沿线，时时看到堆积如山的黄豆因受雨

淋霉烂。然而，就在这同时，一批又一批饥民饿死在路旁。

重庆的夜，星光与灯光相连，几乎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使人迷惘，令人困惑，韩丁与朋友杰·坦纳鲍姆常常漫步在嘉陵江边，他的思绪就像那江水一样不息地奔流。

“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根本上讲是贫穷，贫穷是万恶之源。”坦纳鲍姆仰着他那宽大的脑袋，挥着强有力的拳头，“我们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立足点也正在这里。”

“可是，我担心，有谁能填满如此穷困的深渊！”韩丁叹息着摇摇头。

“当然，主要还得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

“可是，我看这恐怕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

……

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里，韩丁和坦纳鲍姆带着这样的思考第一次去红岩村。

据说，这里原来名叫红岩嘴，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路军办事处，也有人干脆叫它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社都设在这里，周恩来任总书记。

天空飘着细雨，仿佛在昏黄的灯光下，挂着一张丝线织成的网，潮湿的石板路闪烁着青冷的光。韩丁和坦纳鲍姆小心谨慎地走在那条曲折蜿蜒的小巷里。他们知道，这

一带完全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报社到华龙桥街口，有好几家茶馆，时时有特务扮成“茶客”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来往人员经常受到跟踪，盯梢，甚至迫害。

韩丁他们走进办事处，出来迎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秀美，机敏而活泼，她是周恩来的秘书龚澎。她满面笑容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Welcome Dear friends!”

在她的引导下，韩丁和坦纳鲍姆并肩向院子里走去，他们见许多工作人员都在紧张而和谐地忙碌着，刚才走在小巷里的那种紧张情绪渐渐消失了。

就在这个晚上，韩丁第一次结识了周恩来。

韩丁称这是一次永生难忘的会见。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微笑，那双手仿佛流淌着奔腾的情感，一下子把我们融化为一体……”

韩丁向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前景的疑虑。

周恩来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起，双目闪烁着动人的光彩，他充满自信地说：“经过八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亚洲最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武装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于感觉这胜利来得快了点，早了点。因为，他们始终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把日本法西斯作为二号敌人。然而，不论怎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人民的意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违背

的，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

那天晚上，韩丁他们从周恩来的住所出来，已是深夜了。韩丁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坦纳鲍姆几乎一夜未能入睡。

韩丁回忆说：“那个晚上，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鼓舞着我，多少天来萦绕在我们心中的迷团，突然有了一线光亮。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以强有力的来势在我的思维中撞击……”

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新的反共高潮，实施他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部队主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已经扩大到 19 个省市地区，人口达一亿，抗日部队 120 万人，民兵 230 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偏处西南一线，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嫡系部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准备，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还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与此同时，任命了一批投敌汉奸如孙良诚、周佛海等为司令长官或总指挥。而作为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的美国政府则加紧实施其对华政策，派遣运输机帮助蒋介石把大批国民党部队运往华南、华中、华北地区。

一出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日伪合流的丑剧上演了。

这出戏的演出需要时间。

8 月 14 日起，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

家安危之大计”。

“毛泽东会不会来？”几乎整个山城都在议论着，猜测着。

8月28日，韩丁接到通知，有重要新闻采访，下午三点多钟，韩丁匆匆赶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这里已经先到了很多人，他们当中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群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轻声交谈着，不时地举首遥望长空，正是盛夏酷暑，万里无云，蓝天如洗。

突然，从遥远的天际隐隐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便在蓝天下渐渐显现出一个银色的光点，它由小到大，在阳光下闪烁，紧接着，马达声越来越强，震耳欲聋，摇天撼地，随着一阵呼啸的气流，飞机徐徐降落下来。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飞机涌去，韩丁迅速跑上前，占领了拍摄的有利位置。

仓门一开，一位身材高大，头上戴一顶白色巴拿马船型帽的人挥着手向人们致意。他身着宽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刚刚走出仓门，机场上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欢迎毛泽东！”

“欢迎毛先生！”

.....

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大手，迈开大步走向人群，亲切地和一双双伸来的手紧紧相握，就在这一瞬间，韩丁拍下了